

## 唐景云年间的陇右分治

裴恒涛

(遵义师范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作为陇右道的主体部分,河西走廊在唐朝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从陇右道中析出河西道。陇右分治不仅反映出唐朝初期疆域的扩张轨迹,同时也反映出唐朝西北民族关系的消长变化。

**关键词:** 景云二年; 陇右分治; 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 K28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27(2012)02-0050-05

### 一、陇右道分治及其相关背景

公元711年之前的陇右道包括今天甘肃河西走廊、宁夏、青海的部分地区、新疆的广大地区,以及帕米尔高原附近的部分中亚地区,地域辽阔,处于两大民族政权的交汇地带,北边前期是突厥,后期是回鹘,南边是吐谷浑、吐蕃,在其西部今天山南北分布着众多的西域民族政权。“河西陇右,地处祖国大西北的中轴,居高屋建瓴之势。回顾历史,凡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若跨有河陇即可建成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若委弃河陇,就可能出现分裂割据的偏安局面”<sup>[1]</sup>。

河西道从陇右道分离出来是在景云二年(711)五月。《唐会要》卷70载“景云二年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带江山,疆界阔远,于是分为山南东西两道。又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sup>[2]</sup>《资治通鉴》卷210载“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sup>[3]</sup>这不仅是军事区域与监察区域的变动,也是行政和地理区域的变动。对陇右道分出河西道,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日本的前田正名倾向于行政区域的变动,认为“景云二年分离出来的河西道,并不仅仅是历来称为河西走廊的地区,而且它还包括走廊西北部、西部的辽阔地区。在此可以肯定,河西道与另外十道相比,则拥有完全不同的地区性。即河西道与西域在政治上是同一个行政区域。”<sup>[4]</sup>史念海倾向于陇右道曾短暂分治,但很快废省。<sup>[5]</sup>

《新唐书》卷37载“太宗元年(627),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sup>[6]</sup>唐前期的陇右道,史载其地理范围和所辖州县为“陇右道,盖古雍、梁二州之境,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总为鹑首分。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sup>[7]</sup>除此之外,陇右道所辖属的还有大量的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sup>[8]</sup>其数量仅次于剑南道所领羁縻府州,占羁縻府州总数八百五十六的近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贞观时期的陇右道地域广大,山河阔远。通过地图可以发现,河西走廊连接陇右道的东西部,地处唐帝国政治中心长安与西域交通中枢,其本身又比较狭窄,南近吐谷浑与吐蕃,北接突厥。容易为敌对的游牧势力所拦腰截断,从而使唐的西域地区成为“飞地”,威胁到唐帝国的根基所在关中地区。所以,根据西北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陇右道南北游牧实力的消长情况,对陇右道进行政治、军事的战略调整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景云二年的陇右分治

收稿日期:2011-10-16

作者简介:裴恒涛(1980-),男,河南宜阳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关系、民族史。

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及考虑。

但是,在史书及学者的论述中只涉及贞观十道和开元二十一年(733),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增置京畿道、都畿道、黔中道,并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共十五道。“……置十五采访使,监察如汉刺史之职。”<sup>[9]</sup>却没有提及景云二年的陇右分置。但《新唐书》指出:“天宝盗起,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复陇右。”<sup>[10]</sup>可见,河西、陇右分别提起,说明景云二年的分治应是事实。总之,从贞观年间到开元时期的近一百年中,唐代的监察、行政、军事区划处在不断的变化与调整时期。贞观时期主要是基于地理划分更多具有监察区性质的道处在从监察区向行政区转化的过程中(处置采访使),同时,道的行政执政与军事执政开始重合,地域开始缩小,逐渐成为节度使辖区。

## 二、陇右道分治所反映的民族问题

无论是陇右道军事建制的分立,还是行政、监察区域的分割,都说明了陇右道在唐帝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唐王朝在陇右地区的部署调整反映了当时西北民族、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问题。

### (一) 反映出唐帝国初期疆域的扩张轨迹

陇右分治的初衷在于更好地治理陇右所辖地域,这是唐初在西边开拓的结果。唐之前陇右、河西已有基于地理上的行政建制。至武德二年(619),唐先后消灭薛举、李轨割据政权,占据陇右、河西地区,继续向西推进。至太宗时唐朝由东到西,陆续征服了天山南北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沙漠绿洲小国,并在这些地方建立羁縻统治。这些沙漠中的稀疏据点,成为唐朝控制西域,对抗西突厥和吐蕃等民族势力的战略屏障和有效防线。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找寻出这种轨迹。“明年(即贞观二年,628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又增州二,县六。其后,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踰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sup>[11]</sup>之后,唐王朝以焉耆、高昌为据点,继续向西扩张。贞观十八年(644),平焉耆;贞观二十二年(648),灭龟兹,疏勒、于田二国内附,唐设置焉耆、龟兹、疏勒、于田四个都督府,安西都护府从西州移治龟兹城。高宗显庆二年(657),唐朝击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统一西域。

高昌国的统治中心在今甘肃敦煌。唐朝灭高昌,是唐朝控制河西走廊,向西域扩张的重要一步。高昌国(约507-640年),其王姓麹,也称麹氏高昌国,以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而建。太宗初期,曾与唐王朝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唐朝攻灭高昌的根本原

因与唐太宗心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一统观念密切相关。如当太宗接到灭龟兹、平西域的报告时,兴奋地对群臣说“夫乐有几,朕尝言之:土城竹马,童儿乐也;饬金翠罗纨,妇人乐也;贸迁有无,商贾乐也;高官厚秩,士大夫乐也;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朕今乐矣!”<sup>[12]</sup>而其近因,依据现存汉文史籍,则在于高昌与西突厥的亲近,阻隔西域诸国的朝贡之路,威胁唐朝的利益。高昌国为西域诸国进入河西地区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重要。再加上高昌国主文滞留华人归唐,并且与西突厥攻占焉耆城池。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力排众议,派侯君集等率突厥、契苾骑兵数万,共灭高昌国,史称“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sup>[13]</sup>在该地设立州县,进行直接统治。

### (二) 反映出唐西北诸民族及政权力量的消长变化

唐朝前期,西突厥和吐蕃曾一度达成了针对唐王朝的某种战略联合,使唐朝在陇右地区疲惫不堪,穷于应付。

首先,吐谷浑在隋末唐初得以复兴,其处于吐蕃与唐朝的中间,对唐、蕃双方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吐谷浑为自身利益考虑,游离于两强之间。史载“太宗时,伏允遣使者入朝,未还,即寇鄯州”,“又掠岷州”“俄寇凉州”。<sup>[14]</sup>贞观九年(635),唐曾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六路大军及突厥、契苾部兵马进击吐谷浑,给予其沉重打击,迫使吐谷浑称臣内服。之后,唐通过和亲、派兵声援等方式加强双方的关系。而吐谷浑内部围绕对唐、吐蕃的政策,矛盾分化,大臣争权,局势混乱。史称“其相宣王跋扈,谋作乱,欲袭公主,劫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知之,引轻骑走鄯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毅都尉席君买率兵与威信王共讨,斩其兄弟三人,国大扰。”<sup>[15]</sup>高宗时,唐、吐谷浑、吐蕃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由于吐蕃的攻势加强,高宗又施行了不当的中立政策,而且吐谷浑势力弱小,终为唐、吐蕃所瓜分,吐蕃最终占有吐谷浑故地。史载“既而与吐蕃相攻,上书相曲直,并来请师,天子两不许。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诺曷钵不支,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帝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平两国怨。吐蕃遂有其地。”<sup>[16]</sup>吐蕃占据吐谷浑故地,对唐朝形成极大的威胁。于是,高宗咸亨元年(670),为恢复吐谷浑故地,唐与吐蕃大战于大非川,结果唐军大败。与此同时,失去青海故地的吐谷浑余部在诺曷钵亡后,于武周朝圣历三年(700)分别在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地归服,凉州都督郭元振力服众议,就地安置,使该地区人户增多。

总之,吐蕃占领吐谷浑故地,使唐朝失去了与吐蕃对抗的缓冲区,吐蕃则把其兵锋推进至唐河陇地区之边缘,迫使唐朝将其防御重心放在河陇的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地,增强了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的综合力量,为景云年间河西节度的设立及河西道的分立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薛延陀在唐初居于突厥之北,曾称臣于突厥。贞观年间,唐灭突厥颉利可汗后,回纥与薛延陀南下占有大部分突厥故地,势力增强。史称“突厥已亡,惟回纥与薛延陀为最雄疆。”<sup>[17]</sup>后回纥部灭薛延陀,臣属于唐朝。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在其他各部也设立相应的都督府,并在原来的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李素立为燕然都护,统辖该地。武周时期(684—705年),随着东突厥复国及回归故地,对回纥各部的生存空间产生了重大影响,回纥势力此时不足以应对复兴后的突厥,各部被迫迁徙,一部北迁,一部又臣服于突厥,还有一些部落则迁往陇右河西地区。史载,“武后时,突厥默啜方疆,取铁勒(即回纥)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sup>[18]</sup>赤水军为河西节度使的重要军镇,这说明回纥在河西节度使及河西道的运作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也进一步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多民族格局之形成。

再次,高宗、武则天时期东突厥势力的复兴及建国,结束了唐王朝“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sup>[19]</sup>的局面,并与唐王朝在北部及西北交接地带展开了大规模的交锋,给唐陇右地区的边防形势带来严峻挑战。史称“默啜负胜轻中国,有骄志,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默啜剽陇右牧马万匹去,俄复盗边。”<sup>[20]</sup>与此同时,唐王朝也加强了在北方的防御力量,一个显著的事件是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三受降城的设置。但突厥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游牧政权,其本身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三受降城防御设施的修建并不能防止突厥势力从其他方向进犯唐朝,其经常从西北方向上即陇右河西的北部发动进攻。可以说在陇右道分治前后,威胁唐帝国北部边防特别是陇右道北部的最大势力就是复兴后的突厥,它与吐蕃一北一南,夹击着唐王朝的陇右道。因此,对当地行政军事建制的适当调整就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在唐王朝向西域扩张的过程中,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完成其内部统一之后也开始向外扩张,两大政治势力在西域和河陇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只不过在唐太宗时期(627—649年),由于唐蕃之间的和亲关系和吐谷浑政权的存在,同时由于唐朝政治稳定,国力渐增,而此时吐蕃主要致力于内

部的统一和政权制度建设,所以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唐太宗和松赞干布去世之后,双方冲突不断。高宗龙朔二年(662),吐蕃攻陷唐西域的于田、疏勒。次年,吐蕃灭吐谷浑。乾封二年(667),吐蕃攻陷西羌12州。咸亨元年(670),攻陷唐西域18州,唐西域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焉耆再度陷没,安西都护府东移西州交河城。同年,唐蕃大非川之战爆发,唐军大败,吐蕃兵峰直逼凉州。之后双方在这两个地区争夺不断。“自是吐蕃连岁寇边”,“上元三年(676),进寇鄯、廓等州,杀掠人吏”<sup>[21]</sup>。为加强凉州地区防御的吐蕃力量,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时任凉州都督的郭元振在凉州附近置和戎城(今甘肃古浪县城南)、白亭军(今甘肃民勤县境),同时在河西兴水利,开屯田。这一举措,一方面有效地防御了吐蕃,另一方面也为之后的河西道分置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出,从高宗显庆二年(657),唐朝击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基本解除突厥势力的威胁后,吐蕃成为唐朝在河陇及西域的最大敌人。唐朝不断通过各种军事、政治、经济的方式加强对河陇地区的治理力度。到睿宗时,为了进一步强化管理及防御吐蕃,对陇右道作重新部署,从陇右道分置河西道,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事实上,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二月,“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副使治甘州,领都知河西兵马使。”<sup>[22]</sup>以贺拔延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五月,从陇右道分置河西道,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7州,治凉州。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唐朝于武阶击败吐蕃的进犯之后,又进一步明确设置新的陇右节度使,确立河西分治后陇右道的具体管辖范围,时间是开元五年(717),史载“置陇右节度,亦曰陇西节度,兼陇右道经略大使,领秦、河、渭、鄯、兰、临、武、洮、岷、廓、叠、宕十二州,治鄯州。”<sup>[23]</sup>

### (三) 反映出唐代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

所谓地缘政治结构,指的是受到政治制度、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而形成的地理空间结构。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地缘政治结构主要指的是地方行政制度约束下所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层级结构,政治环境造就的行政区地理空间结构,以及监察区划的地理空间政治结构等。<sup>[24]</sup>建立合理的地缘政治结构,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依据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进行地方行政区和监察区的划分;其次是行政区的层级和管辖幅度要合理。唐前期十道有监察区的性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国防形势的变化,地理、行政管辖的趋势明显。711年的陇右分

治析置河西道,固然有便于监察的考虑,但原因不仅如此,还有交通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因素。笔者认为,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原来的陇右道过于辽阔,东西狭长,不便于管理。以黄河为界,把陇右道化为河西道和陇右道,分别建立行政管辖机构,可以缩小管辖范围,从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划出河西道,加强军事守控。把河西道作为国防的前哨重镇,相应的把靠近关中的陇右道作为战略后方或者缓冲区,这样对唐政治中心长安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当时唐的一些大臣也有此认识。武后时,吐蕃曾向唐朝乞和,吐蕃大将论钦陵请求唐朝罢去安西四镇的士兵,披十姓之地。唐朝遣郭元振出使吐蕃,探听虚实。郭元振回来后,向武后提交一份报告。主要内容为“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所患,唯吐蕃与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将大利于中国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镇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凉有一日警,岂堪广调发耶?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钦陵以四镇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易为我患,亦国家之要。”<sup>[25]</sup>郭元振认为,陇右道下辖的甘、凉、瓜、肃等州对于唐朝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就像吐谷浑故地青海对于吐蕃的重要战略地位一样。武后时,突厥和吐蕃经常联合寇凉州。郭元振在担任凉州都督的五年中,筑和戎城、白亭军军事要点,开拓边境1500多里,有效地遏制了吐蕃和突厥的攻势。神龙中,郭元振担任安西大都护,在招降安抚西突厥,抵制吐蕃进攻,巩固四镇、十姓方面功劳显著,深得西域各族的拥戴。

### 三、陇右分治对唐朝的影响

陇右分治对唐王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深远的。一方面,它增强了唐代西北的军事力量,对于西北边防形势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开元、天宝年间,吐蕃与大食、突骑施联合进犯唐安西四镇,唐征调河西地区驻军主动出击,多次取得胜利,保全了四镇、控制了西域,同时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因而河西关陇地区长期稳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唐帝国能居于当时世界强大国家的前列。<sup>[26]</sup>史料中可以看到陇右道与河西道军事上配合防御吐蕃的记载,如(玄宗开元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口,互出兵腹背击之。”<sup>[27]</sup>同时,也可以看出,分治后设立

的陇右道节度,由于有河西节度作为相对的后方,使其可以从容地与关内道北部的军镇相配合,打击北方民族的叛乱与进攻。开元九年到十年(721—722)爆发了六州之乱,唐朝利用朔方军与陇右节度的联合行动,平定了叛乱。河西节度与安西、北庭都护互相协作,维护了广大西域地区的稳定。正如张九龄起草的致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都护王斛斯,致北庭都护、瀚海军使盖嘉运,以及致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等敕书中一再提到要王、盖相互“计会”,互通消息,协同作战。“且西、庭虽无节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贼共除,有患相救。万里之外,何待奏闻。自此之后,必须用意”。<sup>[28]</sup>说明在军事行动上,西城镇兵无论安西或北庭,还是河西节度,总是相互支持,协同行动。当然,这种协同是以陇右节度的战略支撑、后方声援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学者一般认为节度使最早设立于睿宗景云二年,即认为把陇右道分出河西道、设立河西节度使作为唐代节度使设立的开始。史载景云元年(710)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sup>[29]</sup>次年,即711年,正式确定了河西节度使的行政建制,以黄河为界,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专设河西道。“谓之节度使,自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后诸因同此号。”<sup>[30]</sup>河西节度使的职责在于“断隔羌胡”,即切断突厥与吐蕃的联合,配合安西四镇,确保西域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加强了河西道的兵力部署。开元初,河西节度使的兵力为“官兵十万三千人,马万九百匹”<sup>[31]</sup>,在同时期陆续设立的十节度使中兵力雄厚,可谓是“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sup>[32]</sup>这样的军事配置从短期来看,加强了唐朝河西的军事力量,对于对抗吐蕃和突厥在西域、河西的侵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使唐初的守内虚外的军事部署思想及府兵制的军事制度渐遭破坏,外重内轻的局面开始形成,一旦风吹草动,不但不能保障西北边防的安全,且直接冲击了唐帝国的根本利益。

总之,行政军事建制的变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与王朝的国力与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关系密切。由于许多史籍对陇右分治往往一笔带过,故难以从史籍本身了解到更多相关的细节。因此,本文对陇右分治只是基于史料的一种推断性描述。另一方面,伴随着几大民族势力的兴衰更替与唐帝国中央集权力量的强弱变化,陇右河西地区的民族形势极为复杂多变。通过对陇右分治前后相关背景的分析,向人们展示出当时河陇地区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唐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拓展和治理情况。

## 参考文献:

- [1] 陈守忠. 河陇史地考述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127.
- [2] [30] [宋]王溥. 唐会要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233. 1425.
- [3] [27] [29] [31] [32]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666. 6781. 6660. 1386. 6895.
- [4] [日]前田正名, 著. 陈俊谋, 译. 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141.
- [5] 史念海. 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 [J], 唐史论丛, 1988 (1).
-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5]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59. 1039 – 1040. 1119. 960. 960. 959 – 960. 6231. 6222. 6224 – 6225. 6226. 6227. 6112. 6114. 6042. 6064 – 6065. 1861 – 1862. 1863. 4361 – 4362.
- [21] [后晋]刘昫. 旧唐书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223.
- [24] 成一农. 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 [A]. 李孝聪, 主编. 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 [C].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 [26] 王兴. 王兴说隋唐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80.
- [28] [清]董诰, 等编. 全唐文·卷 28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899 – 2900.
- (责任编辑 陈柏萍)

## The Partition of Longyou Road in the Second Year of JingYun ( AD 711) in the Tang Dynasty

PEI Heng-tao

**Abstract:** Hexi as the main part of Longyou wa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second year of JingYun of Emperor RuiZong ( AD 711) ,Hexi Road was separated from Longyou Road. The partition of Longyou district reflected the expansio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 of ethnic relations in northwest region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AD 711; Longyou's partition; ethnic problems